

聚焦中石化业务整合

继 5 月份整顿高管兼职后再度重磅出击清理各地分公司非主营资产

中石化拟“收兵”金融有机化工业务

□本报记者 李雁争

继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石化)今年 5 月开始整顿高管兼职后,其“清理门户”的“拳头”近日再度重磅出击。

记者昨天从山东滨州某大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得知,在效益最好之际,其大股东之一——中石化山东省分公司近日突然宣布退出,并要求年底之前办妥全部手续。

另据了解,中石化各地分公司正在从金融、有机化工、小炼厂等非主营资产中陆续退出。这是在中石化集团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后,其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行动。

石化业务全面收缩

上述山东公司主营医药化工、炼油等业务。自从该公司改制后,就一直由中石化山东省分公司保留着 15% 的股份,同时,中石化山东省分公司的财务处处长出任该公司董事。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上安排主要是出于资源和信息等方面的考虑。按照国家规定,作为民营企业只能从国有巨头手中购买原油。而中石化的胜利油田则坐落于山东滨州。因此,在当地政府的撮合下,中石化山东分公司当然是最好的股东人选。

同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2001 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成品油必须由中石油、中石化集团批发,并进一步赋予了两大集团零售专营权。这就意味着,作为中石化参股的企业,该公司在成品油的销售方面,其地位就远远超过了其它“草根”炼厂。

更难得的是,在近三年的原油上涨周期中,来自中石化的董事总是能提前“预见”到成品油调价的消息。而根据这种“预测”来安排生产进度,该公司也因此获利不少。

关于即将和中石化结束合作关系,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很急迫,态度也非常坚决。”目前,中石化山东分公司正在对该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此后将在当地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对于分手后的前景,该公司

负责人表示,多年的合作毕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预计在买油方面不会出现太多问题。但公司已经决定,今后要将重心逐步从炼油业务转向医药化工。

根据了解,在中石化主力油田——胜利油田的附近,多年来形成了数百家化工企业。目前,很多企业都遇到类似的棘手问题。

或将整合金融资源

与有机化工相比,中石化对金融资产的处置已先行一步。几天前,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挂出 6 条保险公司股权转让信息,3000 万股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和 500 万股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等待易主,出售上述股权的 6 家公司清一色为“中石化系”。

其中,3000 万股大保集团股权分别由中石化金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等 5 家出售,除金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转让 1000 万股外,其余 4 家均转让 500 万股。这 5 家转让的股权占大保集团总股本的 0.6978%,挂牌交易价格为 4380 万元,平均每股 1.46 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胜利石油管理局从华泰财险退出后,中石化总公司和旗下的中石化财务公司仍然分别持有华泰财险 9.75% 和 9% 的股权。从目前华泰财险第一大股安泰达天平再保险占股 10% 来看,中石化才是实际控制人。

因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中石化并非意在对外出让手中的金融资源,而是为了将子公司的金融资源进行整合。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也认为,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大型企业进行“自保”更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无碍保险事业的发展。

中石化集团人士也表示,对于集团发展必要的业务,也不是一定要全部退出。但是一定要在总公司的统一部署下发展,各地分公司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做大、做强主业,是中石化的战略目标 资料图

陈同海:分公司要坚决退出非主营业务

□本报记者 李雁争

昨天,中石化集团在北京召开“清理整顿对外投资和多种经营工作会议”。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陈同海在会上指出,各地分公司必须服从做大、做强主业的战略目标,坚决从非主营业务中退出。

陈同海说,清理整顿工作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调整调整的具体体现。中央要求,国有经济必须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推动国家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

他说,目前中石化的资产总量、经营规模已经进入国际大公司行列,但面对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按照国际化的要求,去枝强干,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主业的发展,真正把中国石化做强做大,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按照该集团总体部署,各地分公司清理整顿

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根据介绍,清理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涉及到既得者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各分公司的负责人都在对外经营中兼任着重要职务,清理工作一定会动摇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涉足公司太多,作为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中石化现有全资子公司、控股和参股子公司、分公司等共 80 余家。按照最保守估计,每家分公司在 5 个企业中进行过投资,全国就有数百家民营企业受到牵连,退出工作的进度难以估量。

记者了解到,清理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涉及到既得者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各分公司的负责人都在对外经营中兼任着重要职务,清理工作一定会动摇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涉足公司太多,作为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中石化现有全资子公司、控股和参股子公司、分公司等共 80 余家。按照最保守估计,每家分公司在 5 个企业中进行过投资,全国就有数百家民营企业受到牵连,退出工作的进度难以估量。

中石化“清理门户”背景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石化集团各地分局急剧扩张。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多种经营在为安置职工家属、方便职工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 年,中石化集团按照国家提出的“主辅分离”原则,开始实施改制分流。累计向国家上报了 3 批改制分流方案,涉及改制单位 811 家。同时,实施退出宾馆、电信等

非核心业务的改革。

2005 年 10 月,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改制工作的通知》,预示着国企改革热潮即将到来。

2005 年 12 月,中石化集团成立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职责是“有选择地发展增量业务;集中处理好有关资产、退出有关业务等。”

从单平被罢免看高校破产隐忧

□吕翔

《200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5 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 1500 亿元以上,不少地方高校目前都已负债累累。比如,山东省教育厅所属 23 所高校截至 2005 年 5 月,贷款余额 754 亿元,仅利息就需要 43 亿元,而省政府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 1 亿元。一些中央直属高校同样债务缠身。11 月 15 日的《中国财经报》等媒体引用业内人士的话说:“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破产的说法主要来源于高校的无序扩张。如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

大学城投资金额达 50 亿元,广州大学城总投资 120 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 40 亿到 50 亿元。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有限,高校扩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据业内人士估计,银行贷款占到学校基建总投资的 80% 以上(《河南日报》10 月 20 日)。一些高校不仅从财务核算上看着已经破产,从实际运行上看,其实也已经陷入困境。现在,每当还款高峰期到来,部分高校的运转就有困难。

而 11 月 21 日,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的被罢免,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大学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资产流失问题,有可能成为引发高校资金危机的另一隐忧。据《上海证券报》

记者调查,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 8 月,单平擅自与深圳某公司签订《委托资金管理协议》,将学校 1 亿元资金分三次交给该公司,用于在股票二级市场进行运作。该公司收到学校资金并购买股票后,将所购股票用于质押融资。截至目前,天津大学到账资金仅 23467 万元,该校 1 亿资本金损失至少 375883 万元。

因为一位校长的决策失误,375883 万元资金化为乌有。实际上,这种触目惊心的资产流失现象并非个例。那么,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权力分配角度看,“负责制”是对高校决策权与执

行政权的分离,即党委被授予决策权,校长被授予执行权,两者相互制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权力分配平衡常常被打断。比如,对单平事件,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是:单平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把本应由集体决定的重大事项为个人决断。问题在于,天津大学多达 1 亿元的资金,单平竟然能够一人作主,交给某公司,其权力制衡机制还存在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反省。

其实,高校的扩张何尝不与此有关?一些高校之所以敢于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扩张,动辄投资数亿元资金扩建,与权力制衡机制失控、大学主要负责人员断专行无关系。基建投资巨大,在权力监督

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仅此一条,就足以令高校的负责人有盲目扩张冲动。更何况,贷款来自于国有银行,高校也是国家的。一些校长确信,无论高校欠债多少,国家也不会将之关停。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校的扩建乃是一种必然。

无论资产流失还是盲目扩张,都与高校主要负责人权力过大而又缺少制约有关,这是导致高校破产隐患加大的主要根源。因而,有关部门应该从单平事件中吸取教训,及时消除高校主要负责人一手遮天的现象,加强权力监督。最广泛质疑的一点是,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说法,具体的收费由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完成社团登记程序,权利人委托该协会代为行使。但是,这个协会本身并没有收费资格,它有什么权力让别人代收?

不仅如此,对于“每个包间每天收取 12 元”的 KTV 版权收费标准人们也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是 12 元?不久前,杭州、上海等地的 KTV 业主对 12 元的版权收费标准曾提出集体抗议,包括郭磊、董赫男在内的 12 名一线音乐人还在北京发表了一份联名声明,反对“12 元标准”(《广州日报》11 月 11 日)。这些抵制并非不愿意交费,而是要求版权费的收取要合理、合法。

为什么对于版权收费这种事关娱乐行业利益的事情,有关部门事先未与他们进行沟通和协商?事实上,有关部门不仅未与娱乐行业进行很好的沟通,有关部门之间也未能进行

美对我铜版纸发起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表示遗憾

□本报记者 薛黎

美国商务部于美国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作出了针对中国铜版纸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立案决定,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随后就此表示,中方对美方做出对中国铜版纸反补贴调查的立案决定表示遗憾,美方的这一决定既不符合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也违反了美国的有关法律规。

10 月 31 日美国 New Page 纸业公司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申诉,要求对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三个国家的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及反补贴立案调查,该案调查期为 2006 年 4 月至 9 月。

广发证券研发部副经理陆鸣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铜版纸的出口确实获得了突飞猛进的,今年全年的出口额大约将是去年的 4-5 倍,而且首次实现出口大于进口,但中国的铜版纸行业不存在所谓的政府补贴,市场化程度很高。

正如崇泉所说,美方不顾中国 20 多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坚持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在对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取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另一方面,又同时对中国产品启动反补贴调查,已经构成了对中国产品的双重歧视。

记者获悉,美国商务部将于明年 4 月最终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但此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于今年 12 月中期开始征收

临时关税以弥补美国企业的损失。

美国 New Page 纸业公司已经向官方提出对韩国相关企业征收 71.81% 的反倾销税,但对中国企业可能征收的反倾销税则不得而知。据陆鸣说,我国铜版纸主要出口市场在印度和香港。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韩国对美国出口铜版纸约 3.2 亿美元,而美国对美出口只有 8100 万美元。

“美国铜版纸行业对外竞争对手掀起反倾销战役也是迫于生存压力。”陆鸣说,美国工业近两年的疲软趋势影响了铜版纸行业的发展,本土铜版纸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中国铜版纸价格、质量优势越来越明显,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据悉,我国今年前三季度铜版纸出口增长强劲,出口价格在 530 美元/吨左右,而美国本土铜版纸价格已经飙升到 650 多美元/吨。

中国铜版纸的出口价格相对较低不是国家补贴所致,而是近年来国内铜版纸市场竞争激烈后的自然结果,随着进口纸浆、化工原料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代价是急剧下降。

自 2003 年中国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采取反倾销措施后,我国铜版纸行业获得了 5 年发展的关键期,国内企业这些年经历了“拚命扩张产能”、市场整合等阶段,目前国内产纸 80% 至 90% 的供应量集中在几个主要生产商身上,例如金东、晨鸣、苏州紫兴、大字、泉林等。

下月起征土地增值税搅动二手房市

北京大户型二手房成交量激增

□本报记者 唐文祺

自 12 月 1 日起,北京市转让二手房将强制征收土地增值税。这一消息周一经传出,北京二手房市场立刻开始呈现出小幅波动态势。昨天,北京“我爱我家”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京城近期三居室以上的大户型二手房成交量,成交量大幅上升了 33%。

将土地增值税的完税证明与房产过户手续相挂钩,表明了相关税务部门的政策实施力度与决心。虽然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将由 12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但是市场上大户型二手房交易已经受到政策较为明显的影响。在政策下发后的这两天,北京二手房市场的大户型二手

商品房,房源登记量有所下降,降幅 23%,客户需求量下降 24%,成交量上升 33%。但是,缴税较少的小户型房源依然保持平稳态势。

“我爱我家”人士分析,大户型房源波动明显,主要是由于征收土地增值税有“区别对待”的细化处理。普通住宅转让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转让非普通住宅的,凡居住满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也免于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转让居住满三年未满五年的普通住宅,则减半征收土地增值税;居住未三年的,按规定计征土地增值税。根据相关征收条件,3 居室以上的大户型绝大部分恰恰属于非普通住宅范畴,因此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卡拉 OK 版权收费标准应尽快统一

□冯光明

卡拉 OK 版权收费标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1 月 20 日,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发表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 OK 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如果强行在广州地区开展收费活动,协会将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手段维护其会员合法权益的权利。随后,上海市娱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来南也表示,在法律主体尚未解决之前,对于任何强行在上海地区上门开展收费的“不合法行为”,该协会将采取法律途径等多种不同方式坚决抵制(《北京晚报》11 月 22 日)。

行业协会的态度,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卡拉 OK 版权收费标准由于存在诸多瑕疵,未能得到业界的认同。最广泛质疑的一点是,根据国家版权局的说法,具体的收费由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执行,由于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没完成社团登记程序,权利人委托该协会代为行使。但是,这个协会本身并没有收费资格,它有什么权力让别人代收?

不仅如此,对于“每个包间每天收取 12 元”的 KTV 版权收费标准人们也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是 12 元?不久前,杭州、上海等地的 KTV 业主对 12 元的版权收费标准曾提出集体抗议,包括郭磊、董赫男在内的 12 名一线音乐人还在北京发表了一份联名声明,反对“12 元标准”(《广州日报》11 月 11 日)。这些抵制并非不愿意交费,而是要求版权费的收取要合理、合法。

为什么对于版权收费这种事关娱乐行业利益的事情,有关部门事先未与他们进行沟通和协商?事实上,有关部门不仅未与娱乐行业进行很好的沟通,有关部门之间也未能进行

很好的沟通。文化部和版权局,都在各自出台收费标准。今年 7 月,文化部宣布,“全国卡拉 OK 内部管理服务体系”项目启动,同月,国家版权局批复收费标准,对卡拉 OK 厅使用音乐电视作品收取使用费;8 月 3 日,文化部网站公布了“全国卡拉 OK 内部管理服务体系”项目有关内容。8 月 21 日,国家版权局就版权使用收费标准进行公示;11 月 7 日和 11 月 9 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与国家版权局相继在不同地区展开收费试点。文化部选择的是武汉、郑州和青岛三个试点城市,而国家版权局选择的是北京、上海、广州三个试点。

文化部和版权局制定的收费标准在收费主体、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比如,文化部是根据歌曲点播的收费,而国家版权局是根据包房来收费。再比如收费主体,文化部认定的是词曲作者以及其他权利人,而国家版权局认定的是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在一个国家,对于卡拉 OK 版权收费问题,不可能同时由两个部门按照两套截然不同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进行收取,如此,必然导致混乱。

问题是,这种混乱局面至今未能得到解决,如果持续下去,公众将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部门的收费,势必造成重复收费,加重公众的负担。实际上,这也正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目前,许多人对文化部和版权局两个部门互不协商、各行其事的说法表示难以理解,因为这让广大公众无所适从。鉴于卡拉 OK 版权收费标准混乱的现状,国家有关方面应出面协调,促使两部进行沟通,并与著作权人及其他权利人沟通,拿出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案,尽快结束目前的僵局。

官员“当众撒谎”应严惩不贷

□贾图

11 月 21 日,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今年第 3 批挂牌督办的 6 起环境案件,与以往两部门挂牌的企业肆意违法排污、地方政府出上台政策的案件不同,今天被挂牌的还有“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市长当众撒谎欺骗督查组”的案件。把政府部门负责人道德问题列为督办案件,在两部门联手实施挂牌督办案件制度以来还是第一次(《中国青年报》11 月 22 日)。

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身为官员,更应该诚实守信,为民众作出表率。在很多国家,诚实都被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官员竞

选中,如果某位官员被曝出说谎的丑闻,他可能很快就被选民抛弃,因为公众确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能真正以公共利益为重,才能真心实意为民众服务。诚信的重要性,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2002 年 1 月底,德国一家报纸刊登文说,和许多白发苍苍的政治家相比,今年 57 岁的施罗德真是年轻呀,尤其是他那头乌亮的黑发就能吸引不少德国妇女的选票!德国 DDP 通讯社等媒体引用一名政治顾问的话说:“如果施罗德不染发的话,他的形象将会更加真实。”由此惹来巨大麻烦。反对党想借此掀起风波,给施罗德的竞选设置障碍:如果最后发现施罗德染了发,就证

实他在说谎,尽管是私事,也多少能够削弱施罗德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影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取舍。影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取舍。在反对党和传媒的推波助澜下,“染发和诚信”一时超过了经济不景气、失业居高不下等通常情况下竞选中的热点话题。施罗德在随后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已落后于对手 5 个百分点。无奈之下,施罗德将那家通讯社告上了德国汉堡一家法院,法庭经过调查,认为施罗德没有染发,的确是“纯天然”的,还了施罗德清白(《南方都市报》2002 年 5 月 18 日)。

由此可见,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诚信要求是非常高的。与六盘水市那位副市长的说谎相比,染发这件

事情几乎可以忽略不提。今年 9 月 22 日,在六盘水市,当国务院派出的贵州督查组的负责人向当地政府询问该市环境质量时,六盘水市副市长叶大川表示,“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常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城市空气质量为贵州省 9 地市最好”,“在六盘水境内没有任何煤化工企业”,“水源保护区也没有任何工业企业”。督查组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些说法并不属实。

这位副市长当众说谎,或许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但是,这个谎言却是他说出来的,他应当知道说谎的后果,也理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

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这位副市长当众对督查组说谎,影响极其恶劣,理应严惩。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我们亟需构筑起一个讲真话的环境和氛围,首先就应以具体的个例向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鼓励讲真话的信号,只有对个别说谎的官员予以严厉惩处,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才能逐渐促使官员讲真话、讲实话。